



革命的
盾与剑

[苏]A·B·基什科夫 著
王 宏 达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2.45
5

革命的盾与剑

[苏] A·B·基什科夫 著

王宏达译

群众出版社

革命的盾与剑

[苏] A. B. 基什科夫著 王宏达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2.625印张 59千字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67·404 定价: 0.58元

内 容 提 要

1917年11月7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处在万分危急之中。国内反革命地主武装，反动的军官在一些地区割据地盘，搞反革命武装暴动。前临时政府及旧沙皇的官吏、公爵、贵族、将军、资本家、反动的士官生同所有敌对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沆瀣一气，结成联盟；他们与英、法、美等国的间谍互相勾结在一起，准备里应外合，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各种反动组织也应运而生。苏维埃国家党、政机关及军队里也混进了一些他们的代理人。这股反革命势力一方面以公开的武装暴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采取各种各样隐蔽的阴谋活动，妄图破坏俄国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他们策划和煽动怠工，投机倒把，炸毁桥梁，暗杀苏维埃国家及党的主要领导人，破坏交通运输，使城市粮食和燃料严重短缺。这股汇合在一起的国内外反动势力，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企图以此来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非常委员会及肃反工作人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与反革命势力展开了一场复杂、曲折、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最后终于彻底摧毁了各种反革命阴谋组织，捍卫了十月革命成果，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

本书专门阐述了全俄非常委员会历史的片段。通过几个故事，比较生动具体地介绍了苏联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揭露、粉碎反革命阴谋、消除怠工及其它破坏行动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事迹。

作者A·B·基什科夫曾写过《捷尔任斯基》和《鲁多列夫·阿别列在美国法庭上》，读者对他是比较熟悉的。

目 录

- 一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1)
- 二 第一件事..... (5)
- 三 不走运的独裁者..... (11)
- 四 洛卡尔特先生的计划破产..... (29)
- 五 铲除《民族中心》..... (50)
- 六 托岗采夫教授的阴谋..... (68)

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为了纪念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五周年，画了一个盾和一把裸露的利剑，这是“光荣的肃反工作人员”的特征。这个盾和剑象征着其活动的实质。全俄非常委员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盾，同时也是无情打击她的敌人的一把利剑。这个标志后来成为苏维埃国家安全机关的象征。

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全俄非常委员会很快就于1917年12月7日(20日)，在遍及全国的残酷的阶级搏斗的烈火中诞生。

资产阶级、地主、旧社会的所有特权阶层企图疯狂地推翻立足尚未稳定的苏维埃政权。就在彼得格勒十月武装取得胜利后第二天，被推翻的原临时政府的首脑克伦斯基命令克拉斯诺夫为首的哥萨克部队向首都推进，企图扼杀革命。彼得格勒在反革命分子所组成的《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0月29日开始叛乱。军事学校的学员参加了叛乱，一些士官生在莫斯科也同时开始叛乱。

在彼得格勒叛乱的士官生当天就被革命的士兵、水兵、赤卫军战士所粉碎；31日凌晨，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部队在普尔科夫附近的战斗中也被击溃。

经过七天激烈的战斗后，11月3日凌晨，革命部队攻下了克里姆林宫。一伙反革命分子在莫斯科被粉碎。

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首次尝试失败了。但是反革命势力与苏维埃政权的较量这仅仅是开头。顿河的卡列金部队的首领依靠哥萨克人的反革命部队建立了武装斗争的危险的基地。阿列克

谢也夫和科尔尼洛夫将军开始在顿河地区建立反革命志愿军。在南乌拉尔哥萨克首领杜托夫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在俄国的一些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打着维护民族独立的旗号也向苏维埃政权宣战。

资产阶级收买和勾结了一批刑事犯、道德上不坚定的人，并唆使他们去抢劫和进行大破坏，想在国内制造混乱，引起劳动人民对新政权的不满。资产阶级报纸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则大肆诽谤，造谣中伤。

国家机关及公共企业职员们的怠工情况在加剧。由于一些官员和在政府各部门、地方金库、银行、邮局、电报局、市参议会、学校、医院职员中的上层分子与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拒不服从苏维埃政权，拒绝在由其派遣的人员的领导下工作。一些人随意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另一些蓄意把事情搞乱，还有一些人盗窃文件和保险柜钥匙。银行的职员不发给苏维埃机关经费，却拨款给反革命组织。这些怠工者的目的是：使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政权执行机关的工作陷入混乱状态。保皇党、立宪民主党、右翼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以及其他一些反苏维埃阵营的代表都参加了反革命的怠工。怠工者并得到英、法、美帝国主义的援助。

1917年12月6日，人民委员苏维埃研究了政府机关的职员策划全俄罗斯进行罢工的问题，并委托费·埃·捷尔任斯基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用“最强有力的革命措施”来制止这次罢工。捷尔任斯基必须在第二天向人民委员苏维埃提出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以及和怠工行为作斗争的建议措施。

12月7日晨，费·埃·捷尔任斯基收到了弗·伊·列宁的一个便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更广泛的问题：即定出措施不仅要制裁怠工者，尤其要打击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反对苏维埃政权。

弗·伊·列宁写道：“能否形成类似的法令……资产阶级、地主及一切富有阶级正在垂死挣扎来破坏革命，这个革命必须保障工人、劳动人民及受剥削群众的利益。

资产阶级正走向最恶毒的犯罪道路，收买社会渣滓和堕落分子，勾结他们达到大破坏的目的。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尤其是上层职员及银行的官员和诸如此类的人，他们消极怠工，策划罢工，以便对政府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产生动摇。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甚至粮食供给工作人员也怠工停止供应粮食，妄图用饥饿来威胁千百万人民的生命。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与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者进行斗争。”

1917年12月7日晚，费·埃·捷尔任斯基在人民委员苏维埃会议上，按列宁指示的精神作了报告。人民委员苏维埃会议通过了建立附属于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的非常委员会并批准了其组成人员。

委员会面临的任务是：“……制止并消除不论从哪些人方面来的在全俄范围内的一切反革命怠工的企图及行动；将一切怠工者及反革命分子提交革命法庭审判，并制定出与其作斗争的措施。人民委员苏维埃也确定了全俄非常委员会的权力：……委员会只进行事先的调查……”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革命军事委员的领导人之一费·埃·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全俄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特点是对革命的敌人毫不妥协，是一个有钢铁般的意志和无限忠诚的人。

起初，对革命的敌人采取这样一些措施来作为惩罚，如“没收财产，勒令搬家，剥夺配给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等”。有时，反革命分子“许下诺言”，不再干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事而把他们放了。但是，一旦获得释放，他们就继续嚣张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随着剥削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反抗的加剧及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猖狂活动，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反击行动。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德国最高统帅部违背了与苏维埃俄国签订的停战条件，在全线开始进攻，敌人的部队威胁着彼得格勒；1918年2月21日，人民委员苏维埃通过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宣言。国内的一切力量和财物全部都用于保卫革命的事业。一切苏维埃机关和革命的组织都有责任不惜牺牲到底，保卫每一块阵地。颁布指令，命令对敌方的间谍、反革命的鼓动者、德国的特务以及投机商和盗贼要就地枪决。

这个指令规定了全俄非常委员会的今后活动的任务。她不仅成为事先调查制止、预防反革命犯罪行为的机构，而且成为具有惩罚职能的机构。后来，根据国内军事、政治与社会的形势的需要，全俄非常委员会的惩罚权力不止一次地收缩过或扩大过。

全俄非常委员会忠实地为革命服务。她所碰到的对手在各种知识方面占优势，他们具有多年的组织和指挥经验，并与国际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全俄非常委员会从艰苦的搏斗中粉碎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而经常成为胜利者。

苏维埃肃反工作人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巩固苏维埃共和国、对揭露、粉碎和清除多次的阴谋活动、怠工行为、投机倒把以及其它的破坏活动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她的援助，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取得了胜利，并顺利地协助共产党及苏联政府有效地采取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措施。

本书专门阐述了全俄非常委员会历史的某些片断，其中谈到了揭露某些最危险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二、第一件事

1917年12月22日，在全俄非常委员会全体委员开会之前，费·埃·捷尔任斯基翻阅了一下关于各部、机关职员及官员的反革命怠工问题的材料。因为捷尔任斯基是不久前才撤销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个苏维埃肃清反革命与刑事犯罪作斗争的机构）的领导人之一，所以他十分了解与怠工作斗争的经过。

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917年10月26日，地下的《各部长小苏维埃》，其中包括被推翻的临时政府中的被释放留下来的成员，作出了决议：要官员们不要服从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宣布成立的工农政府——人民委员苏维埃，并决定国家机关停止工作。苏维埃政府晚了一些时候才知道了这一情况。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想起了，11月20日，当人民委员苏维埃开会时，有个消瘦的高个子曼日斯基宣读了一份截获的揭露《部长小苏维埃》策划怠工的电报，其中包括粮食供应的怠工。

“这群恶棍！他们企图用饥饿来扼杀革命！”曼日斯基愤怒地说。“军队已经好几天没有一点面包屑啦，彼得格勒的粮食只够吃两天，四个人分一份！”

人民委员苏维埃通过决议，逮捕《部长小苏维埃》的全体人员。

组织官员们罢工的倡议是由彼得格勒的国家机关的职员联合会负责发起的。它拼凑了一个中央罢工委员会。盘踞在联合会和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开展了狂妄的活动。资产阶级对罢工活动给予拨款，立宪民主党临时政府

原财政部长厄·尼·库特勒尔分两次拨给罢工委员会一百多万卢布；知名的富翁斯托赫也夫、烟厂厂主波格达诺夫以及其他一些资本家都拨出了一笔巨款。在彼得格勒，在各部、各机关都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总工者在全俄罗斯的范围内策划着国家机关职员的大罢工……

全俄非常委员会委员伊·克·克塞诺丰特夫走进了捷尔任斯基的办公室。

“费利克思·埃德蒙多维奇，委派开始行动的工作人员已集合好了，在听候您的命令。”

捷尔任斯基看了一下表。

“好，已经是时候了。伊万·克塞诺丰特维奇，请他们到我这儿来。”

全俄非常委员会主席细心地打量着走进办公室的肃反工作人员。有身穿水兵呢大衣的、有穿着士兵军大衣的，有穿着工人短上衣的，大部分都是青年。全都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积极参加者。捷尔任斯基在军事委员会工作时已经认识了其中很多人。多好的同志，对他们是信得过的！

捷尔任斯基站了起来。

他说：“同志们！现在我们对总工行为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使总工者无人领导。行动计划是：逮捕中央罢工委员会的魁首，并拿到揭露他们活动的文件，如能办得到，没收总工者的经费。你们必须按以下地址立刻出发：铸造大街46栋，17号，《联合会协会》盘踞在那儿，要进行搜查，拘留在场的全部人员，并将他们押送到全俄非常委员会来。此外，要强夺被拘留者的个人身份证，以及与中央罢工委员会成员的活动有关的文件：如名单、记录、决议、对职员及各机关的宣言……委派克塞诺丰特夫同志为行动负责人。”

不久，载着一批肃反工作人员及赤卫队员的卡车停在铸造

大街的指定楼区。在肃反工作人员一出现的情况下，《联合会协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始慌慌张张地销毁某些文件，很多人企图躲藏起来，但都被拘捕，搜查开始了。

大门口，有一个上年纪的赤卫队员在站岗。这时有一位戴金边眼镜面孔丰润的先生想从门边溜过去。赤卫队员揪住了他的衣袖。这位先生十分愤懑地说：

“您竟胆敢如此！我是社会活动家！我要控告！”

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朝叫喊声走来。

要求他出示证件，这位陌生人掏出了身份证，证件上说明他是内务部一位名叫阿·姆·孔得拉基也夫的官员。

肃反工作人员把身份证又还给了孔得拉基也夫。

“让他坐得离门远一些，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伊万·克塞诺丰特夫下令说。

全俄非常委员会知道，孔得拉基也夫是中央罢工委员会主席。但还须找到证明此事的证据。

拘留了约三十个人，他们全被送往全俄非常委员会。

费·埃·捷尔任斯基的桌上放着一些在搜捕时没收的文件。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看了一下这些文件，并将其分分类。对侦查无关的文件放在左边，与事情有关的和尚需进一步研究的文件放在右边。截获的文件很多。由于工作人员缺少经验，又因文化素养不够，搜查时未能当场对这些文件作出正确的估价。

一些肃反工作人员留心地看着文件分类，感到不好意思，捷尔任斯基发现后微笑着说：

“没有关系，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大家的经验都很少，因为全俄非常委员会成立还不到一个月。经验是完全可以获得的，而你们的行动是正确的。宁可获得多余的文件，比忽视明显的罪证要强。”

委员们都活跃起来了。

捷尔任斯基问克塞诺丰特夫道：

“伊万·克塞诺丰特维奇，您说是这些怠工的先生们销毁了文件，那么毁坏的文件又在哪儿呢？”

克塞诺丰特夫从公文包里拿出用报纸卷着的東西。

“您瞧，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全部丝毫不差地都收集来了。”

捷尔任斯基让参与行动的其他人都离开，仅留下两个人，并开始与他们根据残破的碎纸进行分类，恢复原件。

“您怎么这样耐心？”肃反工作人员看着他，惊奇地说。

“处在秘密状态下活动时是没有机会这样耐心和细心工作的。”捷尔任斯基回答说。

“我相信，我们的劳动是不会白费的。”

正如捷尔任斯基所预料，怠工者匆忙中首先要销毁的是最重要的文件。根据碎纸片用胶印版复原了印成通报。从这份通报中，肃反工作人员了解到，一些职员中，尤其是下层职员，也有反对罢工活动的人。在海关有一个叫费特涅夫的人坚决反对罢工，中央罢工委员会宣布他为破坏罢工者。

在这份通报中公布了罢工委员会的记录。根据记录能够看出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和了解他们所干的事情。在其它一些被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事。例如在从康德拉基也夫那儿拿来的记事册中保留了怠工者的全部簿记，康德拉基也夫准确地记录了何时给谁拨了款，用于什么目的。同样准确地记录了从谁那里得到多少金额的“收入”。

分析文件和审问被拘留者有助于弄清很多怠工的积极策划者。

又进行了一次逮捕。随着被捕人数的增加，全俄非常委员会面临着新的困难，缺少善于审讯的人员。全俄非常委员会不过是二、三十人的小机构，还包括司机和清洁工，而且每天都

行为被制止。

苏维埃政权对待其失败的敌人表现了十分人道主义的精神。所有因“联合会协会”案件而被逮捕的人。除阿·莫·康德拉基也夫外，全部被释放。他们都签字划押，表示不再参与怠工行动。

只有阿·莫·康德拉基也夫，中央罢工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由全俄非常委员会于1918年3月1日送交革命法庭侦查委员会去审讯。第二天，康德拉基也夫也被释放。

某些肃反工作人员感到莫明其妙：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家日以继夜地不断工作，结果却白费劲了。

“明显的反对者都释放了！”老布尔什维克解释说，难道目的仅在于惩罚吗？更重要的是全俄非常委员会使罢工者失去首领，摧毁了罢工委员会的机构，截断了向罢工者提供的财源。肃反工作人员为完全制止官员们怠工创造了条件，并保证了苏维埃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

要发生一些需要处理的新情况。因此，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其中包括捷尔任斯基主席，都参加了对被捕的人的审讯。

罢工委员会的出纳员阿·阿·安东涅维奇向捷尔任斯基报告了一些有趣的情况，身为内务部各部职员联合会的主席康德拉基也夫邀请安东涅维奇到中央罢工委员会来工作。为了执行出纳员的职务，安东涅维奇把从各种人物那里领来的为数3,764卢布91戈比的钱转交给了康德拉基也夫。

其中有一个中央罢工委员会的领工资的秘书阿·雅·列特温年科证明阿·莫·康德拉也夫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列特温年科执行康德拉基也夫的命令，与各罢工组织取得联系。

所以，凭藉文件及阿·莫·康德拉基也夫最亲近的助手的证词能够证实康德拉基也夫在罢工委员会中的领导作用。

侦查结果证明，“联合会联盟”与反苏维埃的政治组织有联系，例如与“保护立宪会议协会”有联系，与银行、大工商业的代表有联系，协会从这些人手里领到经费，向罢工官员发薪金。结果查明参加工人和第一届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主义党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把当时收集来为了用于工人阶级福利的人民血汗钱，将近25万卢布转用于支持罢工。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来制止怠工行为。把怠工者清除出国家机关。在职员中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工作，将其中与劳动人民最接近的人都争取到苏维埃政府这方面来。

怠工者企图与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强迫政府接受停止怠工的条件，以图作出让步。但1918年1月31日，人民委员苏维埃决定，不与怠工者进行任何谈判；如工作需要，人民委员有权接受那些怠工者，但他们要完全服从并支持苏维埃政权……2月15日，这个决定再次得到确认。这一切做法，以及全俄非常委员会采取果断措施的结果，于1918年2月底，终于使怠工

三、不走运的独裁者

在莫斯科大卢贝根街十一号全俄非常委员会大楼的小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雅科夫·赫列斯托丰罗维奇·彼杰尔斯——全俄非常委员会副主席和全俄非常委员会委员、行动局局长马尔登·雅诺维奇·拉齐斯。两人都是老共产党员，两次革命（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而现在是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作斗争的战友。

拉齐斯在专心致志地阅读彼杰尔斯刚刚转给他的一份文件。拉齐斯身材魁梧，留着齐胸的大胡子，宽大的面颊上嵌着一双小眼睛，很象一个温厚的熊，甚至连体格魁梧，开始发胖的彼杰尔斯站在他旁边也觉得有些渺小了。

彼杰尔斯发现，拉齐斯的面孔随着阅读文件变得愈来愈阴沉了。雅科夫·赫列斯托丰罗维奇猜到了，保卫过克里姆林宫的团长的汇报中究竟是什么事使全俄非常委员会行动局局长在操心。团长认为有必要将某些实情向全俄非常委员会报告，这些事实是他从认识的伊维尔斯克医院一位女护士那儿了解到的。女护士说，最近在莫斯科将要发生反革命暴动，并且说，尤其要无情地枪杀拉脱维亚的步兵。关于这件事她是从钟爱她的住在伊维尔斯克医院的一个军官学校的士官生，伊万诺夫那里了解到的。他央求她暂时离开莫斯科，以免除危险及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捷尔任斯基已掌握了这个报告，他的批示也证实了此点：“彼杰尔斯、拉齐斯二同志，你们亲自去侦察一下彼克罗夫斯克村伊维尔斯克医院，对伊万诺夫进行监视。”

“真有趣”——拉齐斯说，“我们以什么身份在医院出现？如

果那里确实隐藏着白卫军，肃反工作人员一去马上会惊动他们的！”

“别耽心，马尔登。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是一位老练的秘密工作者，他已约定好：让我们参加视察医院的保健人民委员部委员会。”

很快保健人民委员部委员会去巡视伊维尔斯克医院。彼杰尔斯和拉齐斯穿着洁白的工作服与委员会的成员一同巡视所有的病房。委员会主席、著名的莫斯科教授对很多病号的病历很感兴趣。医院的主任医生在一旁进行说明。在头两个病房彼杰尔斯和拉齐斯未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病人就是病人。但在下一个病房，肃反工作人员警惕起来了。病房的人谈话的姿势与风度好象是军官。而且很多人十分精神的外貌、健康的体魄，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被人看成是“病号”。拉齐斯决定检验一下自己的疑惑。

“请问在旧军队里您在哪儿服役？”他向一位面色红润、胡子刮得很净的健康人问道。

“在281步兵服役！”随着以军人的姿势清晰地回答。

“您是上校？”

“不是，是中校，第二营营长！”

“祝您尽快康复，中校先生，”拉齐斯说完走向下一个病号。

这样询问了一些人，他感到惊奇：每一个人都能清晰地说出自己姓名，军衔及过去服役过的部队。

“士官生伊万诺夫，”一个穿着军上衣的年轻的淡黄头发男子自我介绍说。他是被询问的最后一个人，拉齐斯细心地看着他。

只有一个消瘦的、容易感情冲动的病号回答说，十月革命前在旧军队“没有荣幸服役，”而在纺织厂当过会计员。

委员会刚离开病房，“会计员”低声地怨恨说：